

· 诗苑译林 ·

苏联三女诗人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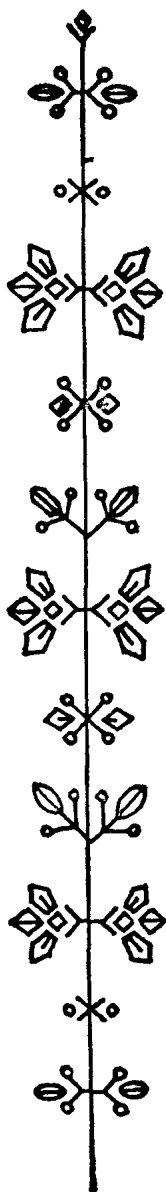
陈耀球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 诗苑译林 ·

苏联三女诗人选集

陈耀球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苏联三女诗人选集

陈耀球 译

责任编辑：杨 实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张：13.75 印数：1—7,800

统一书号：10109·1883 定价：(平装)2.15元 (精装)2.95元



阿赫玛托娃

(1889—1966)



茨维塔耶娃

(1892—1941)



英 蓓 尔
(1890—1972)

《诗苑译林》出版前言

翻译介绍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一个方面的重要工作，它的成就和它所具有的战斗意义，以及它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文学史家已经作出恰切的评价。为了让我国读者欣赏国外诗歌名作，翻译家们进行了辛勤的工作，使这些名作的艺术魅力在我国语言里再现出来，受到了欢迎和重视，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诗的翻译是比较艰苦的。诗是所有文学作品中要求最严格的一种体裁，诗所表现的是人类精微细致的优美感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使这些文化珍宝再现在另一种语言里，绝不是用简单的替换方法可以做到的。我们在短促的、动荡的、战斗的几十年间，已经有这么多在广大读者中象传诵本国名篇一样传诵着的世界名诗名译，翻译家们的辛劳是应该受到尊敬和赞扬的。

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民族最奋发有为的时期，往往对人类文化贡献最多，也最积极地从事文化交流，最善于把自己的文化成果介绍给全世界，同时多方面地努力了解、鉴别和吸收对发展自己民族文化有益的各国文化成果。现代的中国就是这样的。

通过对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我们看到，尽管使用的语言不同，各国优秀诗人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外国诗人广阔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世界，他们绚丽多彩的艺术经验，引起我国诗人的浓厚兴趣；他们在艺术上的勇敢探索，得到了热情的反应。我国诗歌界不断地予以介绍，不少我国现代诗人同时又是优秀的翻译家。

我们编印《诗苑译林》，就是希望以我们微薄的能力，为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一点工作。《诗苑译林》的内容将是：一、“五四”以来翻译的外国诗歌名作，包括已出版而长期没有再印的，已发表但没有结集出版的专集或选集。二、至今没有译本，或虽有译本但不够完善的各国重要诗人的重要作品。三、各国各个时代、各个流派有代表性的著名诗人的选集、合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使读者对“五四”以来我国译诗成果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对世界诗歌艺术的发展有个较系统的认识。我们计划使《诗苑译林》逐步地成为一套较完整的世界诗歌文库。

《诗苑译林》的编印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首先应该感谢翻译家们对我们的支持、关心和鼓励。也应该感谢湘潭大学彭燕郊教授，他在这套丛书的规划、组稿、审校等工作上，都曾付出过辛勤的劳动。我们愿以热忱、勤奋、审慎的工作，努力使这套丛书的每一本书在质量上都能让读者感到比较满意。我们热烈地期望大家不断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译 本 前 言

一、二十年代，苏联诗坛崛起三位女诗人，她们是：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玛托娃、玛琳娜·伊万诺芙娜·茨维塔耶娃和薇拉·米哈伊洛夫娜·英蓓尔。她们的年龄极其接近，而且都在十月革命之前崭露头角。在二十年代苏联诗歌第一个繁荣时期，她们都是诗坛上极其活跃、有影响的重要诗人。尤其是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死后诗名越来越大，都获得了大诗人和语言大师的桂冠。然而，他们三人一开始却是以不同的流派登上诗坛的。

当今批评界认为，从十月革命起，尤其是在二十年代，苏联诗歌的发展存在着两个互相斗争而又相辅相成的传统。一个是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传统，另一个是以叶赛宁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传统。按照这样的划分，早期也写过沙龙诗的英蓓尔是属于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传统的诗人，而早期曾经是阿克梅派代表人物的阿赫玛托娃和在艺术上与她相近的茨维塔耶娃则是属于叶赛宁诗歌传统的诗人。然而，无论英蓓尔也好，还是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也好，到了后期，又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诗人。尤其是阿赫玛托娃，她一开始登上诗坛，就是以生活作为创作源泉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称她的抒情诗产生于现实生活的土壤。茨

维塔耶娃在早期也曾表示：“我不需要从上帝那里获得‘强烈的感情’和‘必要的思想’。”她的第一本诗集《黄昏诗录》，正是她学生时代生活和感受的诗的记录。其实，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传统或叶赛宁诗歌传统，都没有脱离俄罗斯诗歌传统，而恰恰组成它的两翼。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传统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诗歌传统的民主思想和战斗风格，而叶赛宁诗歌传统则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诗歌传统的抒情色彩。前者长于以理喻人，后者长于以情动人。但是，它们又不能够截然分开，只不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各有侧重罢了。

我觉得，读这三位女诗人的诗，由于她们一开始属于不同的流派，可以看到苏联现代诗坛的缩影。

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这三位女诗人仿佛是三个孪生姐妹：年龄相近，崭露头角的年代相近，虽然开始流派不同然而最终走到了一起。但是，她们之间又有着两个很不相同的地方：生活遭遇不同，艺术风格不同。下面分别作个简要的介绍。

阿赫玛托娃

阿赫玛托娃原姓高连珂，1889年生于敖德萨，刚满一岁就搬到彼得堡（今列宁格勒）近郊皇村（今普希金城）居住。父亲是一位在海军供职的工程师，母亲出身贵族，受过上流社会的传统教育。1907年，她在基辅符杜克列耶夫中学毕业后，进入彼得堡女子大学法律系学习。但她酷爱文学，尤其

酷爱诗歌。她父亲对文学十分厌恶，不许她用“高连珂”这个姓发表文学作品。于是，她使用鞑靼血统的曾祖母的姓——阿赫玛托娃作为笔名。191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昏》，1914年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念珠》。这两本诗集的出版，是当时俄国文学界的大事，被认为是诗坛上兴起了一颗明星。

阿赫玛托娃沉溺在艺术之宫，对于十月革命不理解，只是经过一段迷误之后，她才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即使在迷误的时候，她也怀抱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感情越到后来越坚定，贯彻了她的一生。这一点，对于阿赫玛托娃这样一位受过严重打击的诗人来说，在今天是应当公正地为她指出的。

十月革命后，一些对革命怀着敌意的知识分子纷纷外逃，并且劝阿赫玛托娃和他们一起流亡。阿赫玛托娃坚持留在破产的、饥饿的、满身血迹的然而又是先进的、战斗的俄罗斯，斥责引诱她出国的人们说：

“但是我平静而又冷淡地
用双手捂住了我的耳朵，
为的是不让这卑劣的言语
玷污了我悲伤的灵魂。”

1917年，她是这样写的。1922年，她又重复了这个声音：

“谁把人间抛给敌人宰割，
我不和他们做一伙。

我不听他们聒耳的谄媚，
我不向他们唱我自己的歌。”

在支持西班牙人民的解放斗争方面，阿赫玛托娃也做了她力所能及的事情。1936年9月29日，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文学》报上发表译著，附记说：“翻译此诗的稿费请转作为自己国家的自由独立而英勇斗争的英雄的西班牙人民的妇女、儿童救济基金。”1941年秋，希特勒兵临列宁格勒城下，城中妇女举行集会并给自己的保卫者们写信，信中写道：“我们的丈夫、兄弟、儿子！请你们记住，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法西斯不能摧毁我们坚定的意志！炸弹吓不倒，困难拖不垮！”阿赫玛托娃是这封信的领头签名者之一。那时候，她和所有的列宁格勒人一样，为保卫列宁格勒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缝制了用于防御工事的沙袋。更有力的是，她的一些鼓舞战斗士气的诗篇，闪电般传遍了卫国战争无边无际的前线。请听她的《誓言》吧：

“今天与爱人永诀的女人，
愿她把悲痛熔铸成为力量。
我们向孩子起誓，向坟墓起誓，
谁也休想使我们屈膝投降。”

再听她《英勇》一诗中豪迈悲壮的声音吧：

“葬身弹雨有什么可怕，

无家可归也决不伤心。

我们牢记你啊，你，

俄罗斯的词汇，俄罗斯的伟大声音。”

卫国战争结束之后，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发布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点名批判作家左琴科和诗人阿赫玛托娃，说阿赫玛托娃是与苏联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把学术问题、诗歌艺术问题弄成了政治问题。阿赫玛托娃的诗的确写得很美，而且早期一部分爱情诗调子比较低沉，与革命时代的强音不大相称，但其中也闪烁着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幸福的追求，有其光明的一面，不能说是“颓废主义。”阿赫玛托娃被从各级作协开除。她虽然沉默了几年，但没有消沉，仍然创作了许多歌颂祖国和战后和平建设的诗歌。五十年代恢复名誉后，常常流露感激之情，把这个时期称作“果实累累的秋天”，创作热情再度高涨。

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悲剧笔调的抒情诗人。她的诗感情炽热、真挚，忧伤中揉杂欢乐，绝望中闪现光明，曲折的思想、矛盾的心理和细腻的感情，总是通过清晰的、富有“物质感”的形象被凝炼在短得不能再短的诗里。所以，读她的诗，就好象手里捧着一个多棱面的晶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透明的，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够一览无余。

“我披着深色的披巾捏住他的双手……

‘为什么你今天脸色惨白忧愁？’

原来是我让他饱尝了

心灵的苦涩的痛楚。

怎能忘记啊！他摇晃着往前走，

歪着嘴唇十分难受……

我没扶楼梯扶手奔下楼来，

跟着他跑到了大门口。

我一边喘气，一边喊叫：‘过去的一切

都是玩笑。你一走，我就会死掉。’

他平静地强颜一笑，对我说：

‘你别站在风里头！’”

一十二行诗，不能说长，然而起伏跌宕，极尽曲折，简直凝炼了一部小说的内容。诗中的人物形象，鲜明得好象就站在你的面前，然而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却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清楚。亲切的交谈和盟誓般的语调，富于感情的、简洁的诗句，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抒情画面。

阿赫玛托娃既顽强地追求抒情语言的极度简洁，又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这种语言的“最高”准确性。类似“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以及“春风又绿江南岸”那样反复推敲的故事，在阿赫玛托娃是不胜枚举的。B·维连金在《文学问题》1983年第6期发表一篇研究阿赫玛托娃手稿的文章，引用了诗人1959年12月24日的一则日记，其中写道：“以前的勇敢，经过三十年以后变得平庸了。存在着另一条道路，这就是准确性，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诗行中的每一个词都各得其所，似乎它一千年以来就是站在这个位置上的，然而读者听到它，却简直是一生中的第一次。这是一条极其艰难的道路，但是一旦做到了，人们就会说：‘这是在写我，这好象是我写的。’我在诵读和听别人吟诵诗的时候，也体验到这种感情（但不经常）。这好象是一种嫉羨，但比嫉羨更高尚。”这里，阿赫玛托娃提到了三十年前的“勇敢”，似乎三十年前她不大注意“推敲”。其实，现在的“推敲”精神是那时候的“推敲”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在同一则日记里又写道：“雪花轻飏。风很平静，很安宁。T很早就出去了，我一直一个人待着，也没有电话来。诗思老是在奔涌，我和往常一样追赶着它，直到听到了真正的诗行。整个十二月，虽然心脏经常发痛，经常发生急速的心悸，但它仍然是一个充满了诗的月份。《米甲》还没有弄好，也就是说似乎有些次要的地方要修改。我反正会把它弄好的。”《米甲》是一首只有二十六行的抒情诗，初稿写于1922年，1959年写这则日记前后进行了修改，最后定稿于1961年。同时，我相信读者已经注意到了，阿赫玛托娃在这里所说的是：“似乎有些次要的地方要修改。”当然，举出这个例子，不是说阿赫玛托娃每作一首诗都要推敲几十年。这首诗完稿时间很长是一个特殊情况，但对于阿赫玛托娃一生的创作来说，这种反复推敲、追求“最高”准确性的精神却是贯彻始终的。维连金在他的文章里，举出了阿赫玛托娃许许多多反复修改的例子。有人说，普希金的诗写得那样美，就是因为他涂改的次数太多了。我觉得这句话也适用于阿赫玛托娃。

阿赫玛托娃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我们的屈原和李商隐也是靠了她的翻译而深入俄语读者的心中的。

1964年，阿赫玛托娃在意大利被授予“埃特纳·陶尔明诺”国际诗歌奖。1966年3月阿赫玛托娃去世，全苏作协理事会、俄罗斯联邦作协理事会及其列宁格勒分会联合发布讣告，称她是“卓越的苏联诗人”，说她的作品“具有充分的根据被认为是伟大的俄罗斯诗歌的杰出成就”。诗人叶夫图申科则把她和普希金相提并论，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而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茨维塔耶娃

茨维塔耶娃生于1892年9月26日，她是莫斯科人。父亲是一位乡村穷苦神甫的儿子，靠着聪颖的天赋和顽强的学习，成了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艺术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鲁缅采夫博物馆馆长，并创建了精美艺术博物馆（今普希金博物馆），大门上还镶着他的头像纪念牌。他于1913年去世。母亲生于俄罗斯化的波兰—德国家庭，富于艺术天才，是位音乐家。她在诗人十四岁的时候（1906年）就去世了，但对诗人的成长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茨维塔耶娃是一位早熟的诗人。他六岁开始写诗，不仅用俄语写，而且用法语和德语写。十六岁开始发表诗作，两年之后，即1910年，当她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出版了分量相当大的第一本诗集《黄昏诗录》，接着，1912年和1913年，

又相继出版了《魔灯》和《摘自两本书》两本诗集。

年轻的茨维塔耶娃性格内向，而且古怪、执拗，见过她的人都说她情绪多变，经常存在着内心矛盾的斗争。她痛恨富人为富不仁，憎恨小市民庸庸碌碌，厌恶一切贪婪和自我陶醉，遇事喜欢打抱不平，并且总是“反对一切人”。这样的性格，应该说是暴动者的性格，只要她心中的那些“魔鬼”起来造反，是可以象勃留索夫、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那样，投入革命的洪流并从中找到创作源泉的。可惜茨维塔耶娃既不理解也不接受十月革命，一度走入歧途。她声称自己不理解也不愿意理解政治，但在诗歌中却把白军运动理想化，从中寻找英雄，赋予它崇高和神圣的性质。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说：“这一点，多多少少与她丈夫是个白军军官有关。”但从后来的表现看，她丈夫倒不是一个顽固分子，而且觉悟很快，对她的影响未必这么深。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度使茨维塔耶娃把自己和旧世界捆在一起呢？据她妹妹阿纳斯塔西娅的《回忆录》（Анастасия Цветаев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Дополн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74），诗人在长诗《魔法师》中描写家里的陈设说：

“一排书架，好象
满得不能再满的蜂房。

.....

希腊的花和罗马的荣光，
数不清的册卷！

.....